

“華工禁約”小說中的西方形象

——以佚名的《苦社會》為例

鄒 小 娟

摘要： 中國晚清以“華工禁約”為主題的小說描寫了被搶奪到異國他鄉的中國勞工受虐和奴役的慘烈遭遇。造成“華工”群體悲劇生活的直接因素為西方商人的殘暴行為。作者站在民族立場上書寫西方人的非人道形象，表達了作者強烈的民族情緒和政治訴求。

關鍵詞： 華工禁約小說；賣豬仔；《苦社會》；民族創傷記憶

以“華工禁約”為題材的小說是20世紀初中國小說比較獨特的內容，作者以文學的形式展示了發生於1905年前後，在被運往美國以及美洲其他國家途中或者已經在異國工作的華工的苦難生活。此類小說基本根據歷史事實撰寫而成，而處於社會急劇轉型期的這段歷史之音似乎被更強有力的民族家國等宏大時代主題所掩蓋，然而，此類小說內容涉及華工被販賣、受虐待和被迫苦役等悲慘經歷與其他頗有社會影響力的晚清小說，立體地，全景式地構築了20世紀初中國小說的繁榮景象。研究此類小說中的西方形象，可以較客觀地展現出具體歷史語境下的晚清作家看待“自我”與“他者”的不同視角。

中國在19世紀之前一向自認為是“世界中心”，“泱泱大國”，“唯我獨尊”的民族心態持續了幾千年。然而，19世紀中期中英鴉片戰爭的失敗標誌著中國與世界強弱關係的轉變，但國人的心理仍然難以接受新的角色。被奴役標誌著強權政治的坍塌。晚清的“華工禁約”為主題的小說正是反映了中國人被外族人奴役的創傷記憶。事實上，中國人被外國商人騙賣到國外做苦力始於19世紀中期。1868年，美國國務卿西華德與清政府蒲安臣簽了《中美續增條約》，為美國商人販賣華工提供了法律依據¹。由此，販賣華工活動愈加張狂，其方式主要以外國人勾結當地地痞流氓，通過坑蒙拐騙，或以豐厚的報酬為誘惑，或以暴力行為活捉中國人。然後將被捉人裝進麻袋，塞到船上，用鎖鏈套住手腳，禁閉起來被運至他鄉異國。途中他們受到非人的虐待，在惡劣的環境中，很多人被致死。

華工到了美國後，主要從事西部採礦、修鐵路和開荒等苦力勞動，遭遇苦不堪言。1872年，美國發生經濟危機，美國工人轉嫁憤怒於華工，形成了一股反對華工的風潮。華工聚集的加利福尼亞州又因此通過了排擠華工的法律，華工的一切權利和就業機會被無情剝奪。華人不准參政、不准從事公共事業。1880年，美國迫使清政府簽訂“中美續修條約”，美國借機大肆迫害華工。1882年，美國頒佈法令，歧視在美華工，禁止從中國再移民，留美華工被迫大量回國。1894年，美國又強迫清

¹ 朱士嘉：《美國迫害華工史料》，中華書局出版社1958年版，第3頁。

政府簽訂限制華工條約，有效期為十年，但到了1904年，美國國會決議排華條約繼續有效，所以引起在美華工的強烈不滿。他們致電清政府要求取締不平等條約，並且聯絡中國內地同胞，進行美貨抵制運動。1905年，全國範圍內的抵制美貨運動展開，給了美國一個有力的打擊，雖然被鎮壓，但此次反帝愛國運動在抗擊外國侵略的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也表明了民族主義思想的覺醒。

華工在美洲的悲慘生活並非虛構。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容闈在1909年他所寫的回憶錄《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記錄了他所見到的華工悲慘遭遇的真相，揭露秘魯來華招募華工專使陳述華工待遇的謊言：

販賣華工，在澳門為一極尋常之事，予已數見不鮮。此多數同胞之受人凌虐，予固常目擊其慘狀。當其被人拐誘，即被禁囚室中不令出。及運奴之船至，乃釋出驅之登船。登船後即迫其簽字，訂作工之約，或赴古巴，或赴秘魯。抵埠登岸後，列華工于市場，若貨物之拍賣，出價高者得之。……直欲令華工終身為其奴隸而後已。以故行時，每於中途演出可駭之慘劇。²

據他回憶，1855年，他從美國回歸途中見到淪落為奴隸的華工的情形，“無數華工，以辮子相連，結成一串，牽往囚室。”³他奉命赴古巴後至秘魯調查華工情況，夜晚他還秘密偷拍華工受鞭笞，身上被烙的斑斑痕跡的場景，看到華工做工的地方如牲畜廠。他發出“場中種種野蠻之舉動，殘暴無復人理”的感歎。

晚清知識份子對此也有回應。梁啟超在1903年做過《記華工禁約》⁴一文中詳細記載了華工禁約事件，提出強國強民是解決外交不平等有力手段。各大報紙也紛紛投入聲援，以廣東和上海兩地最熱烈。據方漢奇在《中國近代報刊史》⁵書中的統計，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報刊充當主力的是在香港出版的幾家報紙：《中國日報》、《世界公益報》、《廣東日報》、《有所謂報》等，在上海出版的《女子世界》、在杭州出版的《杭州白話報》、在廣州出版的《亞洲日報》、《遊藝報》、《時事畫報》、在汕頭出版的《嶺東日報》、日本的《醒獅》、新加坡《圖南日報》；改良派的報刊有：上海的《時報》、廣東和香港的《實報》、《香港商報》、《領海日報》、《時敏報》，北京的《京話日報》、天津的《大公報》等等，這些報刊對華工禁約和抵制美貨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宣傳作用。

按照“華工禁約”這一主題，此類小說有佚名著《苦社會》、碧荷館主人著《黃金世界》、中國涼血人著《拒約奇談》和吳趸人著《劫餘灰》。本文主要以《苦社會》為研究物件，從文本中梳理出有關西方和西方形象的書寫，從文學、歷史和文化的角度考察西方形象生成的原因、特點以及作者的文化心理。

《苦社會》是以“華工禁約運動”為主題的小說類型中最重要的一部力作。作者不詳，無從考

² 容闈：《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頁。

³ 同上，第132頁。

⁴ 梁啟超：《記華工禁約》，《飲冰室文集之七》，《飲冰室合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53頁。

⁵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0頁。

證。⁶ 該小說於1905年，由上海圖書集成局印刷，申報館發行，共四十八回，雙回目，另有楔子。小說首頁有漱石生（孫家振）作序⁷，給予了《苦社會》很高的藝術評價，“夫是書作于旅美華工，以旅美之人，述旅美之事，固宜情真語切，紙上躍然，……幾於有字皆淚、有淚皆血，令人不忍卒讀，而又不可不讀。”⁸ 小說的重點在於表達“苦”的程度。《小說月報》編者在《豬仔還國記》的批語中這樣評價，“黑奴之慘劇，複見於今日之華工。”⁹ 這些評說充分肯定了《苦社會》深刻的思想內容和不同凡響的藝術價值。小說不僅反映了旅美華遭受虐待的社會內容，而且是一部催人淚下、充滿強烈情感的文學作品，引起讀者情感強烈共鳴，的確如阿英稱此為一部反映旅美華工的血淚史。

小說描寫了名叫阮通甫、魯吉園和李心純的三個讀書人謀求生存的苦難遭遇。阮通甫和魯吉園皆因窮困無法度日，只好通過外洋招工的方式打算到外洋去謀生，不幸在販運“華工”的船上遭受極度殘暴的虐待。阮通甫與妻女被販賣華工的洋人暴打虐待而亡。魯吉園雖倖免一死，也沒有逃脫被洋人和工頭隨意暴打和虐待的事實，結局也僅僅是苟活著，為船主華阿大做事糊口。李心純在美國經商數年，因為旅美“華工禁約”受牽連，受當地美國人排擠，致使破產，被迫回國。這三人的悲慘經歷的根本原因並非個人所造成，而在於祖國的羸弱。弱國弱民，國強則民強，國弱則民弱。淪落為西方列強半殖民地的中國，在西方國家主宰的世界格局中，處於被欺侮和壓迫的地位，所以在美華工同樣遭受歧視和不公平的待遇。參與虐待華工的西方人是洋商人，作者聚焦于洋人的暴虐行為，講述了發生在不同場景的諸多暴力事件。

小說以全景式的廣闊視角，再現華工受虐場景。作者重點選取了兩個比較有典型性的場景，分別安排不同有代表性的事件，多維度、深層揭露洋人的兇狠和華工的悲慘經歷。第一個場景集中反映洋人暴虐的故事場景是在運輸華工出洋的船上，敘述與奴隸同命運的華工遭受中國工頭與洋人的暴打情形。第二個場景是在美國本土上華人遭受到美國人欺凌和侮辱事件。按照不同場景所描述的側重，西方形象分為出洋途中的施暴者和在美國本土的虐待者。

出洋船上的施暴者

《苦社會》作者重點表現一個“苦”字，即生與死的苦。在中國文化中死亡是生之苦的終結，也是苦的極致。眾多個人的苦難形成了群體社會的苦難。苦的根源並非來自個人的內心悲苦，而是外部因素社會和“他者”洋人所造成的個人和群體悲劇命運。

小說主要人物之一魯吉園被虐待致死、不少華工也被虐而亡，屍體腐爛在船艙。洋人命令鏟屍丟進大海，華工所帶妻女受洋人侮辱以及洋人強行為中國工人種牛痘等殘忍事件。通過諸多事件，作者以極其憤怒的筆調，刻畫了洋人兇狠、野蠻的獸性行為；中國工頭為虎作倀，不惜殘害同胞。

⁶ 阿英：《晚清小說史》，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頁。

⁷ 《本卷說明》，《苦社會·哭學生·拒約奇談》，《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⁸ 《序》，《苦社會·哭學生·拒約奇談》，《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⁹ 《小說月報》，第3卷第9號，1912年。

第一件暴行發生在小說第二十五回與二十六回。作者具體描寫到一位不知名的華工，被外國人暴打的悲慘情形：

只見胡老大同謝工頭兩個人，扭住一個人的辮，著地拖來。幾個秘魯人押在背後，腳尖、木棒不住的跌打，這人滿頭是血，面目都望不清，衣服上也泛出紅來，嘴裏不哼一哼，兩隻腳望後亂蹬，直到這裏，工頭趕上去，才幫著硬拽進艙，拿條頭號的大鏈，穿進辮子，連身連手腳盤在一根柱子，扣得緊緊的。看這人已是一絲兩氣，外國人才帶眾人走，只留著謝工頭看守著。¹⁰

作者以吉園為視角來展示船上洋人對華工施展的淫威。洋人在船上主宰了華工的命運，掌握生死大權，可以任意毒打他不喜歡的人。作者詳細描寫了遭受毒打，已經血肉模糊的華工們，但沒有標明被打者的身份。這說明華工遭受毒打事件的普遍性，也就是說在船上，任何華工都隨時隨地可能被洋人或工頭毒打或虐待。與19世紀上半葉起美國大量強行掠奪、販賣非洲黑人奴隸的方式並無兩樣。被視為“豬仔”的華工重演著黑人的苦難史，與黑人一樣被販、被任意毆打，顯然淪落到失去自由和基本生存權利的奴隸地位。作者對洋人只進行了聊聊幾筆的簡單卻意味深長的勾畫，其暴虐的特點躍然紙上。作者運用了短小精悍的句子，比較快的敘事節奏，展示出慘不忍睹的場面，烘托了悲劇的氣氛，使得讀者感受到洋人罪惡滔天的行為，在閱讀過程中與作者產生了情感的共鳴。

第二類事件為通甫之死。通甫病重後，他的同伴吉園看到通甫快要死去，要求謝工頭卸下鏈子。恰好碰到洋人爪牙胡老大與一個外國人進來檢查船艙內華工的情況，他們看到亂糟糟的情形，通甫旁邊有女人在痛哭，於是外國人非常生氣，拿起手中的皮鞭亂打：

……通甫的婆子不願走，……外國人又嫌著謝工頭看守不濟，踢了兩下，兩個工頭又複起來拖。

甫死後，妻女痛哭時，眾人看到六七個秘魯洋人，帶了二三十人趕進客艙，看到通甫的妻女不走，便拿皮鞭趕打。後來，洋人吆喝眾人把通甫的屍體拋到大海裏去……。¹¹

洋人不顧華工通甫病重體弱，仍然大發淫威，通甫死後，便要拋屍大海，這是非人性的殘忍行為。“拋屍”更是違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倫道德，是洋人殖民主義暴行的體現。洋人雇用華工去美國本土從事艱辛勞動，洋人與華人本身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中國積弱，列強瓜分，國民受到外國人的奴役，所以洋人視野中的華工不再有人的尊嚴，諸如牲畜，是他們任意鞭打、虐待、發洩的對象。洋人的行為造成通甫一家不幸死在洋人的鞭子下，讀之，的確有“不知揮

¹⁰ 佚名：《苦社会·苦学生·拒约奇谈》，《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¹¹ 佚名：《苦社会·苦学生·拒约奇谈》，《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盡幾升血淚”¹²之痛感，悲劇氣氛尤為濃烈。

第三類為洋人鑿屍事件。小說第二十九回，作者詳細描寫了華工被囚禁在污穢沖天的船艙，洋人清理船艙、命人鑿屍的情景：

從扶梯上走下七八個洋人，背後又跟了一群水手，四個工頭卻一個不見。洋人手裏拿一個瓶。吉園等他們下來，就隱到水手堆裏，看他們的下落。只見洋人一進艙，先叫海帆們一班散手散腳的，走到面前，點了一點數。一個洋人，兩個水手，押上扶梯，便把瓶蓋揭開，在他們站的地方灑下去。……。

卻見洋人又叫水手，先著五十個小工，把腳上的鏈子卸下，喊他們站起。那班小工，驟然覺得腳上松了許多，只是站不起。洋人等得不耐煩，呼呼的又把鞭子抽得怪響。好容易忍著痛，你挨我靠，沿柱站住，洋人喝聲走，又走不動。水手上前，一個拖兩個，望梯邊直送。……直到午時，已走動了一千七八百人。……落後有班人，一個壓一個，亂疊做一堆，水手看見道：“這成什麼樣子，快給我滾開些！眾人還賴著不動。水手們覺得形景詫異，又聞一股惡臭，直從地下沖起，喉嚨裏都作噁心，便去通知了洋人。洋人先用指蘸些藥水，搽在鼻子上，才走過來，叫水手動手。……洋人俯身一看，才曉得死的了，手腳的皮是脫了，骨是折了，不覺也泛出垂涎，嘔個不住。立即叫水手到上面拿來七八個大竹簍，用鐵鏟把這些腐屍鏟下，吩咐連簍丟下海去，水手連運三次運清，都覺頭暈目眩，胸口隱隱有些痛。”¹³

這是被販運的華工在船上受到極其殘酷虐待，被致死的慘狀。洋人兇神惡煞、用鞭子兇狠抽打中國勞工。華人勞工在船上受虐慘死，屍體發臭、又被拋屍于大海。外國人這些令人髮指的暴行一方面反映了洋人對華工的殘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華工在國外的低下地位和受到異族的歧視。“弱國、弱民”是形成華工如此悲慘遭遇的根本原因，清政府的無能，懼外實為華工不幸遭遇的癥結，作者在小說中也指出了問題的所在。吉園告訴同伴中國官員不會管百姓的死活，只在乎搜括民財，有的甚至幫助外國人欺負中國百姓，根本原因是中國官府腐敗、無能，所以百姓遭受外邦欺侮。這實際上是作者本人對華工受虐根本原因的思考。

作者以沉痛的筆調，犀利的筆鋒揭示了洋人草菅人命的事實。華工命若懸絲，為刀俎、魚肉的對立關係，作者給予了弱者深切的同情。讀之，使人淚下。出洋的船上，洋人和華工分別代表了對立的階級集團，霸權階級對被統治者進行了控制，鬥爭和抵抗是兩大階級解決階級衝突的兩種形式。通過描寫這些悲慘的場景，從而喚醒民族意識，“以為後來之華工告，而更為欲來之華工警”。¹⁴

第四類事件為洋人凌辱中國婦女。中國傳統文化中，婦女的貞潔觀至關重要，在某種程度可以

¹² 《序》，《苦社會·苦學生·拒約奇談》，《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頁。

¹³ 《序》，《苦社會·苦學生·拒約奇談》，《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¹⁴ 《序》，《苦社會·苦學生·拒約奇談》，《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超越於生命本身，侮辱女性等同於奪取其性命，洋人在船上並沒有對女性華工採取半點優惠政策，她們與男人一起忍受惡劣的生存條件。

洋人複（回）身進艙來叫女人，卻和氣了很多。學著中國話道：“好生走呵！怕跌時，靠定了欄杆，慢慢上去，不慌呵！”引得女人一個個都紅了臉。又有小腳走不快，洋人也不用水手，自己來攙，嚇得女人縮手不迭。後來下艙，竟掩面悲啼，像受了無限委屈似的。看身上也同海帆們一樣，只剩一衫一褲，有些頭面青一塊，紅一塊，還起了大疙瘩。¹⁵

這並非是洋人對待中國婦女的慈善之舉，而是調戲婦女的手段，與前面虐待中國男人的行為表面上形成巨大的反差。洋人沒有強行對婦女呵斥，但婦女還是沒有逃過被虐待的厄運，仍然被趕到船艙，過著非人的生活，肉體和精神上與中國男人一樣飽受折磨和痛苦的蹂躪。作者採用了不同的敘述方式，表達的主旨沒有改變，從一種方式和維度對洋人惡勢力的控訴。尤其是婦女膽小、怕事等細節真實的描寫，這樣的藝術加工手法增強了故事的悲劇性。

第五類事件為魯吉園在船老大華阿大的房間床底下找到了一本書。書中描寫了中國人在明朝萬曆年間，到呂宋島被大肆屠殺的故事。這則故事雖跨越時空虛構而成，實際上是作者借講述此故事，旨在說明中國人受外族的欺壓和踐踏並非始於今朝。

故事大意是這樣：中國明朝官吏叫做張嶷的大臣，上折奏鳴皇上，說呂宋島盛產結金銀的樹，若派人去呂宋島開採，便可發大財。萬曆皇帝信以為真，便派福建巡撫派縣丞王時和，同張嶷坐船來到呂宋，張告訴頭人他們來發財，頭人大怒，張等趕緊離開。頭人後來懷疑在島上其他中國人的目的，決定殺盡中國人，以除後患。頭人定計，先用重價收買中國人的鐵器，然後再大肆屠殺，中國人手無寸鐵，被逼逃到大爺山上，頭人誘降他們下山，下山的道上設埋伏，中國人被呂宋島頭人殺得一片血海。他們在呂宋島的全部財產盡被沒收，大臣上奏，朝廷敷衍此事，並無追查之意。

這則故事雖然是書本上所虛構的故事，魯吉園認為就是當前到美國的中國人的真實處境，中國旅美華工也許會被洋人像呂宋島頭人那樣，想盡辦法殺盡。作者借用前人的故事，揭示當前被騙上船的華工的危險境遇。作者進一步強調，中國政府的無能，對於海外受難的華人漠不關心。此事件是作者從另外一個角度敘述華人被奴役和屠殺的歷史。

第六類事件為李心純打算到美國去做生意，魯吉園勸說他不要去，美國的種族歧視非常嚴重。現在需要勞動力之際，對待華工十分寬待，將來會因此心生記恨，心純以為美國以自由文明不會剝奪別人的自由。吉園和心純兩人在談論他們對美國的看法，吉園的觀點頗有入木三分的深刻，他一針見血指出美國存在種族歧視的嚴重問題。黃種人是沒有自由可言，在美國做生意一定要小心為佳。而心純對美國還抱有幻想，以為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度，有中國駐美領事保障權利，美國不可違反兩國的條約。事實證明吉園的觀點正確，心純由於過分相信美國，所以不能避免悲劇的命運結局。

¹⁵ 《序》，《苦社会·苦学生·拒约奇谈》，《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通過對話，作者分別塑造了兩位不同的人物形象，他們在同樣的國際形勢下，都是時代局勢的犧牲品。

第七類講述了華工被美國人強迫種牛痘、灑消毒水事件。洋人要求船上散搭的洋人上艙，華人在下艙裏接受種植牛痘，無論以前是否種植過，強硬逼迫再種，“便逐個令解上衣，伸出臂膊，用小尖刀插入玻璃瓶，蘸一蘸，在兩臂連刺六刀。”¹⁶ 美國人在以前對待華工甚是客氣，“（華人）一到碼頭，（美國）本地官紳，聽說來了中國人，爭著招接。後來回國，又陸續來送行。聲稱極喜歡中國人到這裏做些事業，兩邊都有益的，請我們轉致眾人，一番殷勤的情意，賽如一家人。如今地方一天熱鬧一天，……又恨中國人占他的生意，沒事尋事的欺侮，告到官不拘是燒了房子，傷了人命，一概不理，一點的事情，就回護自己的百姓，總怪中國人不好，要打要罰，任他施為，公使哼不得，領事不敢爭”¹⁷ 出洋船上的醫官對於其他各國的人大略望一望，就過去了，查到華人偏是仔細，前身相到後身，左手相到右手，站了不算，還要跑一回，看到華人的行李，挨著灑水消毒，認為中國人像蛇蠍。

美國人在出洋船上對待華人的態度和方式，是通過久居美國華人口中講述的故事。美國人厭惡、嚴重歧視華人，華人被視為毒害。正如薩義德在《東方學》中論述，白人眼中的“東方”是野蠻、愚昧和低下的民族，是白人奴役和征服的物件。東方人對西方人來說是一種謀生之道。西方與東方存在著一種權利關係，支配關係和霸權關係¹⁸。船上的洋人持有高於華人一等的姿態，凌越於華人之上，他們感到自己代表著本民族的一切優秀品質，有權力用文明教導專制，他們想當然認為可以用武力來管理“臣屬民族”。

以上七種華工受虐事件發生在出洋的船上。船內發生的事件共同之處在於華工遠離故土，失去了反抗的可能性。船艙作為狹小逼仄的空間，群體沒有反抗之力。所以文本中虛構的場景可以理解為隱喻著失去根基的弱小社會，被強大的他者洋人與其爪肆意欺凌，剝奪人身自由的基本權利，甚至可以隨意剝奪華工的生命。發生在有限空間的連續事件能更有力、更全面揭露洋人的暴虐和殘忍，將苦社會的苦表現到極致。作為他者的船上施暴者在這個場景中以整體的模糊形象出現，具有符號化的特徵。強大的他者與弱小的華工形成鮮明的二元對立，加深了民族仇恨。作者站在民族立場上安排故事情節，表現民族情緒，具有強烈的政治訴求，而西方形象也被工具化。

在美國本土的虐待者

第二個重要華工禁約故事發生的場景是美國三藩市的唐人聚居區。作者以活生生的例子來說明在美國經商的華人與船上受虐的華工一樣，無法逃脫受“他者”欺凌的苦難。小說通過心純和他的

¹⁶ 《苦社会·苦学生·拒约奇谈》，《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

¹⁷ 同上，第87页。

¹⁸ [美]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页。

朋友來敘述華人在三藩市的生存之苦：華人開的店門前經常有人拋磚擲石，沒有清靜之日。華工與奴隸一樣，出門要帶一張身份憑證，否則要被捉去，遭受暴力懲罰，然後被硬性遣送回國。自禁約之後，不光是華工，一切來美華人包括留學生一律被拘禁起來，然後強制遣送回國，造成父子被迫分離、夫妻天涯各一方等悲劇。商人和老百姓受辱權且不論，小說還講述了一位中國駐美領事隨員受美國巡捕凌辱和毆打，致使中國外交官不能忍受侮辱，最終自殺而亡。中國外交官之死象徵了國家和民族所蒙受的恥辱，就是說在美華人無論什麼身份，從普通百姓到象徵國家權力的外交使臣無一倖免地被欺凌被侮辱。這一類事件的記敘比較駁雜，沒有多少藝術價值，但從不同角度進一步控訴了從“洋商人”為代表的個體到“巡捕”為代表的總體虐待華工的罪行。具體地說，與出洋船上的華人遭遇一樣，在美的華人也毫無自由可言，生命沒有任何保障，生與死都由洋人來操縱的血淋淋的悲劇。加深了民族苦難敘事主題。

在整部小說中，作者運用了不同的敘事方式來講述華工在出洋的船上和在美國本地遭受到洋人虐待和奴役的故事。作者對於船上發生的事件，運用了第三人稱全知敘事者的講述方式，敘述者進入了小說主要人物的內心世界，介入了自我情感，仿佛置身船上華工其中。故事的敘述者也可以理解為隱含作者，所以故事描寫的栩栩如生，具有很強的渲染力。小說後半部分有關華人在美國的經歷，作者採用了第三人稱的局限視點，展示了華人在美國的不平等遭遇的事實，從中，我們也可以不難看出，作者對於華人在美的悲慘遭遇也可能只是聽說，並未親身經歷，所以，他借用他人之口來呈現事實，這是一種不可靠的敘事。在一百年前的晚清，小說剛剛成為文學的文體之一，小說往往只注重反映現實的實用功效，除了吳趸人、李伯元等少數作家，大多數作小說之人很難從藝術表達方式上增加小說的表現力。

總的來說整部小說思想內容深刻，前半部分文學表現藝術性較高。作者以文學的形式，有力地揭露了“華工禁約”這一歷史事件中洋人對待華工及在美華人的罪行。作者站在民族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立場上，控訴洋人的罪行，所以他筆下的洋人呈現出了兇狠、野蠻、惡毒等“魔鬼式”的特徵。無論是船上洋商還是唐人街的巡捕，洋人形象單一，作者將他們置於預設的模式中，人物性格的複雜性被作者懸置。作者對於洋人深懷痛恨之情感，以血和淚呈現出“華工禁約”運動中海外華工的故事。

雖然作者署名不詳，後人也無法考證其生平，但從小說具體的情節描述來看，他一定是關心民族命運，具有強烈時代責任感的知識份子，還可能參與或者目睹過販賣華工事件，所以作者重點突出一個“慘”字，渲染了濃烈的悲劇氣氛。當然，在特殊的歷史語境下，作者不可避免地圍繞“救亡圖存”的時代主旋律而寫作小說，將小說工具化，意識形態化，以此響應梁啟超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發出“文學革命”的號召，文學成為知識份子關心民族命運、關注時局的有力回聲。作者以中國知識份子的身份和民族主義的立場，以文學的方式，講述了中國人的個體在異國的遭遇，個體的遭遇其實可以認為是民族的遭遇和危機的“寓言”。一部催人淚下的華工血淚史也就是一部中華民族遭受西方國家欺凌的苦難史。國家、民族的命運與個人的命運不能分開，國人受難，民族遭劫。

華工被洋人肆意鞭打象徵著中華民族被外族任意瓜分和欺凌。這也是晚清知識份子急於尋求救國良策的原因，從“新民”的改良思想到“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觀點，在亡國滅種的生死關頭，他們對國家積極思考、發憤圖強，體現了知識份子時代責任感，思考社會的真正價值和意義。這也正是這部小說的價值所在。

(本文系武漢大學人文科學院自主項目《二十世紀初中國小說中的西方形象研究》編號(2012YB06)階段性成果之一)

(武漢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